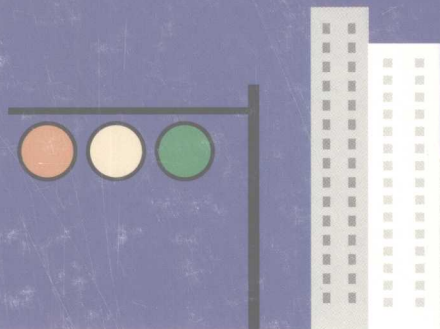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Dorothy J. Solinger



政治与社会译丛

[美] 苏黛瑞 著
王春光 单丽卿 译
王春光 校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在中国城市中 争取公民权

在城郊地区，外来的这些农民——不同程度地分布在不同的聚落——塑造了他们自己的世界，在那里，他们的生存不受户籍制度设定的规则制约。中国人用居住者的家乡省名来命名这些聚落。虽然所有的聚落都被叫做“村”，但事实上，到90年代中期它们就已经以三种不同层级的形态存在着。从结构和组织形式上看，最基本的一类是主要来自同一省的人居住在一起的聚落。第二类是比较成熟些的聚落形态，在那里，居住者是因职业集中在一起的，相互间开展了一些经济合作，在日常生活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帮助。只有在第三类最为发达的聚落中，有些最重要的居住者出面提供社区服务，创建了一些非正式的、非官方的公共福利组织。到90年代中期，就北京而言，只有后面将要讨论到的浙江村符合这一类聚落的标准。这第三类聚落是一种发达的职业共同体形式，类似于被世界其他各国所称的“种族飞地”，如果我们用中国特殊的地域意义来理解“种族”的话。

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Dorothy J. 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 1999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 / (美) 苏黛瑞著; 王春光, 单丽卿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9

(政治与社会译丛. 第2辑)

ISBN 978-7-213-04041-2

I. 在… II. ①苏… ②王… ③单… III. 农村—流动人口—研究—中国 IV. C92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56595号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11-2008-39 号

书 名
作 者

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

[美] 苏黛瑞 著

王春光 单丽卿 译 王春光 校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 (0571) 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2.3万

插 页

2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041-2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政治与社会译丛编辑委员会

第二辑主编 郑永年

编委会成员 朱光磊 张小劲 张 静 林尚立
郁建兴 周光辉 周晓虹 郑永年
黄 平 景跃进 刘亚伟

出版者言

出版本辑“政治与社会译丛”是基于我们对出版职责和中国现实的思考。出版者承担着推动知识的引介、传播以及思想和文化的创新之职能，自然地，面对生活，我们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造。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过去经历了什么，她正在面对什么，她将走向哪里，这是每一个关心、热爱中国的人都应思考的。事实上，这不仅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关注，也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而吸引了世界各地学者的目光，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正呈日渐繁荣之势，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也涌现了许多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潜心研究并撰写出来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我们引进并出版这些著作，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崛起中的中国唯有进一步打开视界，才能更清晰地认识自身，并在和其他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重塑包括学术在内的自身文化的品格。

本辑译丛所选书目是经编委会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的。这些著作研究立场客观，议题重大，视角新颖，体现了众位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对中国问题的准确把握，相信读者会从中获益匪浅。当然，由于作者的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定势，局限与偏见难以避免，读者很可能与我们一样对某些观点难以认同；同时，中国社会变化急遽而深刻，相关著作中涉及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问题以及作者由此得出的论断，也许已经或正在由改革所解决和修正。以上两点，读者诸君不可不察。

上述文字，算是出版者的不算多余的“多余的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春

译丛第二辑序

译丛第一辑序曾指出,译丛的总体目标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寻找和确立一个反思自身现代性的“他者”,在了解“他者”的过程中,认清和确立自身。那么,更进一步,通过认识他者眼中的“我”来认清自身,是不是一条更便捷的路径呢?在确定译丛第二辑书目之时,编委就这样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当代中国研究。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呈现日益繁荣的趋势。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繁荣。随着中国内部的发展和外部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有机分子。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已不能忽视中国因素,都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作为对外政策基础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现状。了解中国的需求使得西方各国对中国研究进行大量的资助。从学术进步来说,中国的转型已经为海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实验室。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为他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素材。欧洲的转型产生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包括马克思、韦伯和杜尔凯姆。中国的大转型可说是一个迥异于西方世界的绝好实验室,提炼自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很多理论框架和范畴都可在此接受检验,或被证伪,或得到拓展充实。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转型现象,那么其说服力就成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研究的学术兴趣已经越出中国问题专家这一群体,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在研究群体中,最值得指出的是,游学海外的具有中国背景的学者成长得很快,并且已经成为当代西方中国研究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的研究往往是他们在西方接受的社会科学训练和他们的中国经验的对话

结果。这种对话是海外学者本身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国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变化也同样重要。传统的汉学基本上把中国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汉学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基本上没有把中国研究整合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与传统汉学不同,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大都基于社会科学,在研究中国的同时努力把中国研究整合到一般社会科学中去。社会科学和中国研究的整合正把海外的中国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所有这些因素驱使下,不断有优秀著作和论文问世。

返回到国内,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复杂性激增,诸种论争近年来愈渐尖锐,改革似乎到了“行路难,多歧路”的困难阶段。改革之初,我们或许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行进到今天,不对过去的历史和当下所面临的复杂现实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认识,那显然会迷失未来的方向。人的理性固然非常有限,而人类的发展也极少遵照人的理性前进。然而,反思过去,尽可能地理解历史,发现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中可能存在的某些模式或规律,使社会尽可能地朝着我们加以认同的方向走去,正是社会科学家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此种背景下,引进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优秀成果无疑是一件急需做的有价值的事情。任何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孤立进行,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既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内部发展必然要关切外部世界的境况。西方中国研究往往采取比较的视角,就是把中国置于国际的环境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研究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取向具有参考价值。就学术进步来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是中国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真正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随着中国的崛起,各方面也在热议如何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但所谓的国际话语权就是说,中国的学术不能自说自话,如果海外不接受中国的话语,那么就很难在国际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中国的话语权必须是在和海外的互相交流和互相辩驳中发生和发展的。而引进海外的中国研究作品当是最有效率的一个途径。

我们也相信,本土研究和域外学术是长短互见的。国内学者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有着无可匹敌的现场面对研究对象的优势和资料获取上的便利,能切身感受变化的细节和活生生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亲历者的地位也可能导致研究者被自身情感所左右,为利益所羁绊,为其所处时代的“迷雾”所蒙蔽,以至于不能跳出一时一地的障碍,发现问题并理性地把握事物的客观性。反过来,域外学者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容易持比较中立、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对象;

更重要的是,受西方深厚的学术传统的熏陶,他们崇尚科学的认知模式,重视经验、崇尚分析、善于系统化,其分析方式、审视的角度和力度往往是国内学者所缺失的。但同样,由于文化和历史的隔膜,他们也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的经验和境遇;他们在分析时所持的预设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适用于特定的中国社会。不过从学术进步的视角来说,学术范式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动力源自于不同范式间的交流和冲突。本土学术范式的进步需要海外学术范式,正如海外学术范式的进步也离不开本土范式一样。

所以,我们一方面期待在此译作的著作能开阔国内读者的视界,增加读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希望我们的读者能随时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些著作,在审视和追问中超越西方理论框架,真正逼近中国的经验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催生和提升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建立真正有活力的中国现代学术乃至社会科学。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谓任重道远,需要学术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郑永年

2008年冬

新加坡国立大学

献给我的丈夫托马斯·P.伯恩斯坦(Thomas P.Bernstein),
是他对农民的同情深深地改变了我

序 言

从1989年春天事件带来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之后,我开始寻求一项研究人民及其抗争的新课题——这样的课题将会调动我的激情,并驱使我对道德问题进行思考,正如1989年事件对我产生的影响一样。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以前所做的学术研究似乎太抽象、太理论化。幸运的是,那年年底,在参加格里高瑞·顾尔鼎(Gregory Guldin)和艾顿·邵瑟尔(Aidan Southall)在北京组织的中国首届国际人类学暨民族学研讨会时,我才得以知道“流动人口”这样一个让人迷惑的新人群。这个人群激发起我去了解他们的愿望,事实上我曾遇到过他们。或许,我在那之前的十年中换了十个住地,也有点像流动人口了。

首先,这样的主题似乎使当时非常流行的有关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那些高度抽象的学术规范研究变得更具人性化。但是,不久后我便开始探讨城市公民权问题,讨论伴随市场进入的外来人口融入城镇日常生活的方式、城市居民和管理部门接纳或不接纳他们的方式,以及在這些过程中存在的歧视问题。

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市场确实正在取代行政命令的作用。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市场对城市中的农民身份产生了什么作用。简而言之,导致农民进城的经济变迁是如何演化为初期的政治变迁的——至少在一开始通过允许那些被城市居民当做农民的流动人口进城定居的方式?而旧有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对这一结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实际上,经济转型正在不断地消解这套制度,使其处于苟延残喘状态。

最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按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初始的市场与流动人口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这样的关系中,不论是市场、流动

人口还是国家,任何一方都对其他方有着深刻的影响。不管现有的文献有什么陈词滥调,越来越清楚的是,市场的诞生并不会那么轻易地将外来者转化为市民,这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本书后面的所有内容都将解释这一点。

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随着我对流动人口这个人群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我也越来越多地获得多方的恩惠和资助。最先,我受惠于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该中心为我去武汉的短期旅行提供了资助。1990年,我正是从那里开始了我的这项研究。第二年,我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那里获得研究奖金,并得以于1991年访问哈尔滨,1992年访问广州、南京、武汉和天津。1993年,在蒋经国基金会(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给予我的博士后奖金的资助下,我告假开始动笔写作本书。在这里,我由衷地感激所有资助过我的这些机构。

还有一些机构以其他方式帮助了我。最关键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于1992年秋冬两季,1993年、1995年、1996年和1997年秋季,邀请我为该所助理高级研究员,慷慨地为我提供免税(duty-free)住所。我在那里获得的时间、空间、激励和资源对这项研究来说绝对是无价之宝。当然,如果没有我的院长威利·舒菲尔德(Willie Schonfeld)宽宏大量地于1991年在我结婚后准许我请一个学季的假留在哥伦比亚,那么我是难以获得如此宝贵的机会的。

我也非常感激如下几个中国研究机构的帮助:天津社会科学院,特别是该院院长王辉、周路和韩麦收(Han Maishou);武汉外事办,特别是丁华(Ding Hua)和尹桂兰(Yin Guilan);武汉政策研究室;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特别是安东尼·凯恩(Anthony Kane);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广东社会科学院(特别是李晓琳[Li Xiaolin])和武汉社会科学院(特别是黄宏运[Huang Hongyun])。还要感谢阮丹青(Danching Ruan)介绍我去认识她天津的朋友。

本书的部分章节曾在下列学术会议上或机构邀请我做演讲时介绍过:亚洲研究会(1991,1994);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服务中心(1991);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1991);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1992);天津社会科学院;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亚洲项目所召集的城市居住、城市生活研讨会(1992);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协会(1992);南加州大学举办的国家科学基金有关前共产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政治学研讨会(1993);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亚洲项目(1993);芝加哥大学东亚研讨会(1993);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亚洲研究中心举办的“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单位”研讨会(1994);哥伦比亚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1995);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的“中国农村:发展中涌现的问题”研讨会(1995);中国和环境研究团体外交关系协会(1995);中国汕头大学举办的“中国南方劳动力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研讨会(1995);卡内基伦理和国际事务协会(1995);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举办的“2010年中国和世界事务”研讨会(1996);德国科隆举办的“移民和流动”国际讨论会(1996);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的非经济影响”学术讨论会(1996);卡内基伦理和国际事务协会在国立首尔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东亚发展及其对人权的影响:东亚人权新问题”研讨会(1996);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1996);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举办的“90年代中国农村劳动力和移民”研讨会(1997)。在这里我无法一一列举名字,但是我衷心感谢以上会议的参加者们给我提供了表达看法并赢得专注倾听和有启发的回馈的机会。我经常受到这些会议的精彩评点的启发,使我重新去思考我的一些发现或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许多朋友和同事也阅读了其中的一些章节,或跟我一起讨论了我的想法。Rick Baum、Francesca Cancian、Anita Chan、Fred Deyo、David Easton、Thu-huong Nguyen-Vo、Tim Oakes、Ken Pomeranz、Tom Rawski、Scott Rozelle、Thomas Scharping、Marty Whyte 和 Bin Wong 都阅读了手稿的一部分,给我提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Regina Abrami、Anita Chan、Judy Banister、Sidney and Alice Goldstein、Gu Shengzu、Han Jun 和 Li Zhang 慷慨地让我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Regina Abrami、Leo Chavez、Debbie Davis、June Dreyer、Thomas Heberer、John Liu、Xiaobo Lu、Frank Pieke、Ken Pomeranz、Scott Rozelle、Wang Shaoguang、David Strand、Scot Tanner 和 Li Zhang 热情地为我提供了相关的参考资料和数据。特别要感谢 Tom Bernstein、Kam Wing Chan 和 David Zweig,他们从观念和想法上很有远见地确保我不断地保持研究兴趣,同时犹如他们自己做相关研究工作那样,不断地为我提供非常有用的文件、书籍和剪报。没有他们无私的帮助,本书将会大为失色;Kam Wing 和 David 提供的书籍和期刊对我这里的分析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有八位朋友不厌其烦地审读了整部书稿。我不能不感激 Tom Bernstein、Claire Kim 和 Liz Perry,他们不辞辛苦地、深入地、认真地阅读了我的书稿。没有他们认真的审读,那么整本书将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逻辑矛

盾和瑕疵；几乎每一页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是我在同他们讨论的过程中得出的。在我的书稿被接纳并最终提交给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几个月中，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为我提供了非常有帮助的建议。Kristi Monroe 坚持要我探讨大问题，用清晰的语言架构我的解答，用引人注目的方式起书名，大大地完善了我的书稿。也正是她，在几年前最早引导我去关注公民权这个概念。

我还要深深地感谢 Kam Wing Chan、Wang Feng 和 Li Zhang，他们研究的主题与我的主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们成了我研究旅途中碰到的可贵伙伴，并且成了我早期草稿的评议者。真的要特别地感谢他们！Jeffrey Wasserstrom 作为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也给了我许多很好的建议。在出版方面，Sheila Levine、Laura Driussi 和 Edith Gladstone 都是非常认真、乐于助人的编辑。我也非常赞赏 Julie Brand 对印刷的尽职精神和态度。随着我的研究接近尾声，我再次衷心地感谢所有朋友的帮助。

在过去的几年中，下列学生为我做了大量的研究协助工作：Cao Meiyong、Lynn Crisanti、Xinyuan Dai、Mark Garlinghouse、Hu Jian、John Smollen、Frank Tan、Nee Tang 和 Zhang Aimei 帮我查找相关的文献资料；Chris Hanks、Sabria Rivera 和 Leilani Wong 帮我整理数据。他们对我要研究的问题的兴趣以及他们高效率的工作，促进了我对研究所需的成千上万资料的收集和梳理。

我也非常感激武汉和南京一些无关联的朋友花精力帮助我联系流动人口采访事宜，他们（但不只限于他们）是 Bernadine Chee、Lu Gang、Lu An 和 Shen Yingquan。1991 年在哈尔滨，1992 年在天津、武汉、广东和南京等地，大约有 50 位中国的城市管理者 and 学者耐心地与我讨论了他们的管理工作和想法。最后感激不尽的是 1992 年到 1994 年期间我在武汉、南京、天津碰到并进行了非正式访谈的四五十位流动民工。自然，我希望我是以读者能理解的方式适宜地处理和叙述了他们的故事。这也是我写作本书的最大动机之一。

目 录

图表目录	5
序言	1
第一章 导言:公民权、市场和国家	1
附录:什么是流动人口?	
第一部分 结 构	
第二章 国家政策(I):将农民变为国民	27
1949年前的人口流动	28
变化的双重根源	33
1949年到1978年:从政权接管到改革	37
经济改革时期的流动人口	47
第三章 城市管理部门(I):流动人口和制度变迁	59
制度变迁	61
计划经济步履蹒跚:政府管理部门的分裂	63
管理手段的不足	83

市场僭越:流动人口的商品化	90
用市场力量进行调控	96
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争论	100
第四章 城市定量供应制度(I):歧视与公共产品	105
转型时期城市人的偏见	108
六类公共产品	116
对城市公共产品体制的瓦解	147
第二部分 行动者	
第五章 国家政策(II):离乡背井的流动人口	159
三个迁移模型	160
为何离开农村? 推力、拉力和宏观社会结构	164
招工过程:社会关系网的影响	189
流动人口与他们的老家	198
第六章 城市管理部门(II):农民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	209
转型中的国家:对外来劳动力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影响	210
城市就业市场:供给与需求	214
六大行业	223

第七章 城市定量供应体制(Ⅱ):体制外解决 与另类公民权	264
流动人口共同体:性别、婚姻状况、工作与满意度	266
住房、粮食、医疗保障与教育	283
组织与领导	299
第八章 结论:流向何方? 制度转型时代的公民权 和市场逻辑	306
参考文献	320
索引	351
译后记	391

图表目录

插图

图 1 街边洗澡(武汉)	128
图 2 街头做饭(武汉)	130
图 3 找工作(北京)	197
图 4 建筑工地休息时间(武汉)	233
图 5 浙江村的年轻裁缝师傅(北京)	255
图 6 拾荒者(广州)	258
图 7 浙江村的露天菜市场(北京)	282
图 8 浙江村内的唯一交通工具:三轮车(北京)	282
图 9 浙江村中工场与住所合二为一的房子(北京)	286
图 10 建筑工人居住的工棚(武汉)	287

表格

1.1 对 1993 到 1995 年农村流动人口的描述性统计	20
3.1 与流动人口有关的各城市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	70
4.1 中国大城市五类公共品的竞争性和弹性	119
5.1 1982—1990 年城乡人均年收入	171
5.2 1989 年人均可耕地少于 1.5 亩的省份	177
5.3 1985、1990 和 1994 年不同区域农村人均收入差距	179
5.4 1989—1990 年各省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就业比例	179
5.5 1990 年人均农业产值低于 2000 元的省份	181
5.6 1990 年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 560 元的省份	181
5.7 1990 年农业劳动者占农村劳动力 65% 以上的省份	183
5.8 1990 年各省农业产值和乡村工业产值占农村总产值的比例	184
5.9 1978、1989 和 1994 年省级人均收入占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比	208
6.1 六个行业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类型	221
7.1 1992 年年中四个城市不同职业的街头被访者解决住房的办法	290